

歐亞白銀重探——錢幣學上的新發現*

[日] 黑田明伸 撰 黃丹丹 譯

[摘要] 現有關於中世紀中西亞錢幣的知識和錢幣學最新的調查結果均證實了大量原產於中國的銀條約於1280、1300及1350年先後抵達歐亞大陸西半部，甚至遠至倫敦，這三個高峰時段恰逢被西汗佔領的、位於中國的諸侯封地（投下）建立或恢復朝貢體系之時。2007年摩爾多瓦老奧爾海伊的遺址挖掘出65條銀條，其形狀與重量說明了從中國封地朝貢的銀幣必定抵達了欽察汗國。而中亞河中及伊朗的與錢幣學相關的研究證據則顯示，於13世紀70年代之後，成色高的銀幣已取代了銅錢及鍍銀銅幣。蒙古帝國政體雖未嚴重影響低層級市場的交易，但因其在全國內的貢品轉移需要採用統一的度量衡體系，恰巧為長途貿易建立了公度性貨幣單位，其後還觸發了整個交易體系在全球範圍的轉型。

[關鍵詞] 白銀 蒙古帝國 中國 投下 朝貢 瓦老奧爾海伊 欽察汗國

一、導言

在人類的歷史上，蒙古政體把橫亘歐亞大陸的不同國家聯合了在一起，故也是首次將不同的貨幣制度連結起來——這些不同的文明國度直至13世紀末仍保留着各自的貨幣制度。直至13世紀中期，歐亞大陸並沒有用於區間貿易清算的共通貨幣單位。而隨着羅馬這一以金、銀、銅為通貨的帝國的瓦解，西歐造幣廠開始完全依賴白銀。東地中海地區（包括拜占庭帝國）繼續延續了羅馬體系；而西亞及南亞則均採用貴重金屬和非貴重物質作為通貨。儘管很多地方有各自的偏好，但白銀基本上已成為西亞地區最為廣泛使用的通貨。雖然一直保持迪拉姆（dirham）這個銀幣的

作者簡介：黑田明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經濟學博士；黃丹丹，澳門大學中英翻譯碩士。

* 本文是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科學研究基金（編號：26285073号〈貨幣の多元性についての国際共同研究：世界史における貨幣間分業とその比較，研究代表者黒田明伸〉（中譯約為“有關貨幣多元性的國際合作研究：世界歷史上貨幣間的分工及其比較，研究負責人黒田明伸”）的成果之一。

名稱，但其實各種形式的銀銅合金、鍍銀銅直至13世紀中期仍在廣泛地被使用。受到錢幣學家稱之為“銀荒”（silver famine）的白銀短缺情況之影響，西亞一些地區開始重新使用黃金作為貨幣。

不過，將白銀作為通貨及貨幣單位這一做法，在歐亞大陸東部並不普遍。中國歷代幾乎都未鑄造過銀幣，在各地區當地主要使用銅幣作為貨幣，區際之間則用以絲綢，銀錠僅用作絲綢的補充貨幣。其周邊國家也依循着中國的方式，例如東土耳其斯坦的相關記載明白地顯示，其地區的稅賦及貿易均以布匹或銅幣進行。^①

13世紀期間，很多國家使用貨品作為主要的交換單位，如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便是以毛皮作為交換單位。特別是某些穀物和布匹，常被廣泛用於當地市場交易之中。德國沿海的呂根島（Rügen），其居民在12世紀便使用亞麻布作為貨幣。^② 13世紀時中國嘉興的農民，則將米帶到魏塘鎮市場以交換鹽油。^③

然而，在13世紀的最後25年，歐亞大陸突然開始廣泛使用白銀作為貨幣。14世紀上半葉，白銀的流通持續增強。這期間白銀的數量似乎比15世紀更為充裕。隨着這一時期白銀在歐亞大陸流通量的不斷增加，稅賦也開始逐漸以白銀的形式來徵收。

16世紀70年代，玻利維亞南部波托西（Potosí）的白銀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流通。有人認為16世紀貴金屬的廣泛流通現象預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崛起。與16世紀末白銀作為實體貨幣流通的“白銀繁榮”（silver boom）時期不同，13世紀末在泛歐亞大陸，白銀普及的現象是表現在人們把白銀用作通用記帳單位，雖然實體白銀未必廣泛流通。儘管如此，蒙古帝國鼎盛時期白銀在歐亞大陸的興起，可說是為三個世紀後白銀在全球範圍的興盛預鋪了道路。

二、歐亞大陸白銀時代來臨之前：白銀作為絲綢的替代品

19世紀末，在中世紀勃蘭登堡（Brandenburg）的遺址中挖掘出一批尚未鑄造成幣的中式銀錠。依照同時被發掘出土的歐式硬幣上的日期來看，這些白銀最晚在11世紀末就被遺留在那裏。^④ 倘若這些白銀確實來自中國，那麼是甚麼樣的契機將其帶到了德國東部呢？對此，我們需要回顧一下那段比13世紀初蒙古入侵歐洲更早的歷史。

① 關於歐洲，詳見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關於中國，詳見Kuroda Akinobu, “Locating Chinese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and Theoretical Contexts: From Multiple and Complementary Viewpoints,” 參見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年，第33—50頁；關於中亞，詳見[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における通貨》（中譯約為《絲綢之路東部的貨幣》），[日]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中譯約為《中亞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1—40頁。在本文中，筆者使用的詞彙為銅錢而不是青銅幣，旨在避免與16世紀中期之前中國的青銅幣以及之後的黃銅貨幣如嘉慶通寶等混淆。

② T. J. Sargent, F. R. Velde, *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

③ [南宋]方回：《續古今考》，台北：學生書局，1971年，第698頁。

④ 19世紀晚期在中國發現的銀塊被存放在亞麻布袋中。Ernst Friedel, *Hervorragende Kunst-und Alterthums-Gegenstände des Märkischen Provinzial-Museums in Berlin*, Heft 1, Die Hacksilberfunde, Berlin: Verlag von Dr. E. Mertens & Cie, 1896, p. 5.

如果不瞭解絲綢所扮演的貨幣角色，我們便無法瞭解古代及中世紀時期白銀在歐亞大陸東部所發揮的作用。中國以銅錢作為基礎的貨幣制度，這在日常交易是方便的，但對於大規模的交易而言卻顯得龐大不便。西漢時期，開始出現對適合長途運輸的補充貨幣的需求。黃金最初充當高價交易中使用的貨幣，但這一功用並未持續太久。東漢衰敗之後，在稅收從地方政府管理轉移到中央政府管理的過程中，絲綢已經成為賦稅中的主要角色。直至唐代，絲綢依舊是大宗交易中最重要交易工具，例如農耕王朝常用絲綢與遊牧民族換取馬匹這一軍事必備品。^①

唐朝時期，白銀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絲綢的貨幣作用。不過，直至北宋時期白銀才開始明顯地承擔起貨幣角色，而非僅作為裝飾用品。北宋時期開始較常鑄造銀錠，這表明白銀已成為較普遍的貨幣形式。來自銀礦區的貢銀量是關於北宋時期大規模產銀的一個具體線索，1075年，宋代收集了411,420兩（約合16公噸）白銀。產銀的高峰時期可能是11世紀末。當時，單單一個銀礦，如福州附近的寶瑞，便記錄生產有44萬兩的貢銀。而普遍認為的是，貢銀產量僅佔白銀總產量的五分之一，這也就意味著寶瑞當年的白銀產銀總量可能高達220萬兩。^②

11世紀銀礦繁榮發展之時，也正是銅錢鑄造產量不斷增加的時期。元豐年間（1078—1085）宋朝每年發行600萬貫即相當於60億文的銅錢，這是中國歷史上鑄銅量最高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活躍的銅礦通常也產銀礦石，儘管反之並不成立。這恰好與這一時期並沒有鑄銀幣的事實一致，也表明北宋時期所增加的白銀產量並不是計劃中的安排，而僅是不斷增加的鑄造銅錢的副產品。鑄造600萬貫的銅錢需要12,000公噸的銅。因此，即便銅礦石中僅有千分之一的白銀，也意味着在這過程中將產生12公噸的白銀副產品。《天工開物》雖然出版於16世紀末，但當中描述了銅礦石中含有白銀，表明白銀其實為銅生產的副產品。^③

雖然大多數銀礦主要位於中國南部，但大量的白銀主要抵達北部和西部。隨着絲綢貿易的發展，以及北方遊牧王朝與宋朝之間的相對勢力，導致白銀開始向北流動。遼宋兩國於1004年締結的澶淵之盟，要求宋國每年向遼國進貢絲綢20萬匹以及白銀10萬兩。與其相似的慶曆和議，是西夏與北宋於1044年簽訂的。此和議要求宋每年向西夏進貢白銀5萬兩、絲綢13萬匹以及茶葉2萬斤。這些史實表明在11世紀中葉，每年都有6公噸的白銀被送往這兩個遊牧王朝。

對於本節所提到的、在勃蘭登堡所挖掘出的中式銀錠，我們無法確定其確切的出產地。但我們也無法完全否定一個可能性，即宋所產的6公噸貢銀中，有一部分可能到達了德國東部。

作為背景知識，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與歐洲在白銀需求方面的差異。如上所述，儘管從8世紀開始，中國的白銀產量便不斷增加，但在12世紀之前卻鮮少將其用作貨幣。與此相反的是，歐洲，尤其是阿爾卑斯山以北，自羅馬帝國瓦解以來，已經開始完全依賴銀幣。在稅收及大宗交易中，銀幣已是其主要的交易媒介。因此，總括來說，在第二個千禧年初期，相較於歐亞大陸東半部，其西半部對於白銀的需求更加強勁。

① Kuroda Akinobu, "Locating Chinese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and Theoretical Contexts: From Multiple and Complementary Viewpoints," 參見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年，第33—50頁。關於貨幣的互補性，詳見Kuroda Akinobu, "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5, Issue 1 (2008), pp. 7—15.

② 王菱菱：《宋代礦冶業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7—28，59—60頁。

③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8年，第356頁。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單一金屬硬幣是很難適用於各地的所有交易的，如中國使用銅錢作為各種交易的單一貨幣，而中世紀的歐洲則主要使用迪納里厄斯（denarius）銀幣，二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各自的價值差異。按中國的換算規則粗略地來計算，一兩白銀約折合1,000文銅錢，這便意味着一枚銀幣的價值是銅幣的100倍。因而，迪納里厄斯銀幣的價值太高，並不適用於日常交易。^①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歐洲人主要使用布匹和糧食作為交換手段，而銀幣僅是一種記賬單位。

金國這個最終將被元朝取代的王朝，其所統治下的華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白銀作為記賬單位的王朝。然而，使用白銀作為記賬單位並不表示白銀被用於徵稅或購買物品。最初，金國並沒有充裕的銅錢在市面上流通。與其鄰國競爭對手南宋一樣，其主要發行的是以銅錢計價的紙幣。但與宋不同的是，金國的確發行了銀幣，但因其並未成功地在市場上建立起銀幣的流通使用，所以很快便停止使用了。白銀與絲綢一同作為納稅的支付手段，在金元兩國的過渡期間，甚至發行了以絲綢計價的紙幣。^②以此可以看出，11—13世紀的歐亞大陸東半部主要使用白銀作為絲綢的輔助物。這一事實對於理解本文第五節中將提到的銀錠使用方式是很有必要的。然而，雖然大量的中國白銀可能沿着歐亞貿易通道流動，但直到13世紀末環境急劇變動之前，使用白銀作為支付手段還並不常見。

三、歐亞白銀時代的興起與瓦解

在13世紀的最後25年，歐亞大陸的白銀突然變得充裕起來。在1278年的突尼斯（Tunis），白銀比黃金便宜，其價格的下跌似乎與熱那亞（Genoa）白銀價格下跌發生在同一時段。^③摩爾多瓦（Moldavia, Prajesi）的一處窯藏中發現了13世紀最後20年欽察汗國銀幣以及拜占庭金幣。在13—14世紀的高加索地區（Caucasian）的窯藏中，白銀佔據主要地位；而在其他時期，僅發現了來自拜占庭的金幣。^④在伊兒汗國（Ilkhanate）的統治下，白銀產量從13世紀80年代起開始增加。^⑤在西亞地區，貨幣的變化更加明顯地體現在質而非量上。其佔主導地位的貨幣是迪拉姆（dirham）。在13世紀末，成色高且表面更加白淨的銀幣快速地取代了成色低且表明暗沉的銀幣。在河中（Transoxania）地區，這一轉變極為顯著。馬蘇德貝格（Masud Beg）在1271—1272年間禁止發行鍍銀銅迪拉姆，此後便建立了銀幣迪拉姆（含銀量80%）的高成色標準。13世紀80年代，銀幣鑄造廠的數量有所增加。^⑥德里蘇丹（Delhi Sultans）於1295年開始大規模發行銀幣。^⑦而從東土耳其斯坦（East Turkestan）發現的文件表明，在13世紀後半葉，常見的支付方式

① 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38.

② [日]安倍健夫：《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年，第98頁。

③ 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8—179.

④ Ana Boldureanu, “Some Remarks on the Metrology of the Golden Horde Silver Ingots in the Light of a Hoard Found at the Orheiul Vechi,” <http://www.arheomet.ro/ro/evenimente/simpozion2007/rezumat/boldureanu.html>; Andrew M. Watson,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20, No. 2 (1967), p. 18.

⑤ A. P. Martinez, “Regional Mint Outputs and the Dynamics of Bullion Flows through the Il-Xanate,”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8 (1984), p. 155.

⑥ E. A. Davidovich, A. H. Dani, “Coinage and the Monetary System,” in M. S. Asimov, C. E. Bosworth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4(Part 1),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8, p. 406.

⑦ John Deyell, “The China Connection: Problems of Silver Supply in Medieval Bengal,” in John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p. 209.

已發生急劇變化：不再是布匹和銅幣，而是銀幣。^①朝鮮的官方記載文件表示，緊接着蒙古對該地的又一次遠征之後，該地在1278年開始流通使用銀餅。^②這些地方性的相關變化並不都是確鑿的，但就整體而言，他們均表明了13世紀末歐亞大陸開始普遍使用白銀作為貨幣，而這一轉變源自中國。銀幣與尚未鑄造成幣的白銀（如銀錠、銀條、銀餅等）在使用上有着重要的區別，後者的價值取決於其重量。蒙古在建國之初便發行了銀幣，這一點可以從相關考古遺址中得到證實。^③在之後的時期，西部的汗國還繼續使用銀幣，^④而中國其他朝代則大多不願發行銀幣，它們更傾向於按照重量標準使用尚未鑄造成幣的白銀，這使蒙古與這些朝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在征服南宋之後，元朝便開始偏離了其最初對於白銀所採取的政策。元佔據了長江下游這一當時中國最繁榮的地區，南宋首都杭州正座落於此，這一佔領必使元朝獲得一大批的銀錠。據說，丞相伯顏曾下令搜索士兵的白銀以供忽必烈所用。^⑤

1276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制定了一套建立在稅收且以紙鈔為基礎的機制，以幫助實現白銀在整個大陸範圍的流通使用。從1263—1311年（其中1284—1287年除外），元朝禁止在私人交易中使用白銀，但貴族在貿易及宗教活動中仍可使用。政府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壟斷貴金屬的使用，發揮作用的應是1282年制定的金銀工匠全面登錄政策，雖然可能仍有少數漏網之魚。^⑥

我們可以準確地標示這個白銀時代的結局。14世紀50年代，反元叛軍佔領長江下游的核心地區，而這個地區是北京的穀倉，也是出口貿易所需的絲綢及瓷器的供應地。^⑦在長達幾十年的穩定之後，此時寶鈔（紙鈔）的價值開始急劇下降。早前被廢棄使用的銅幣重新返回市場，其相對於寶鈔的價值隨着長江中下游各地區的不同情況而有差異，^⑧白銀隨後退出中國長達大半個世紀，直到明代於1436年引入被稱作金花銀的治稅銀政策才再次出現。

14世紀60年代後，孟加拉（Bengal）的銀幣盧比（rupees）便進入停滯期，而德里（Delhi）也在14世紀末開始面臨白銀短缺的問題。1359年，亞丁（Aden）銀的基本單位重量下降，^⑨14世紀60年代，埃及陷入嚴重白銀短缺，不得不轉而鑄造和使用銅幣。在此期間，愛琴海地區幾乎沒有白銀資源，因而似乎主要依賴於含少量白銀的銅合金鑄幣。正如佩戈洛蒂（Pegolotti）所注意到的，1350年前，塞浦路斯（Cyprus）還流通着幾種不同類型的銀幣，但14世紀後半葉，在希臘的白銀迅速撤離市場，這似乎與上述埃及貨幣供應變化的原因相同。^⑩卡法（Caffa）在1380年後

①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における通貨》（中譯約為《絲綢之路東部的貨幣》），[日]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中譯約為《中亞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1—40頁。

② [朝鮮·李朝]鄭麟趾：《高麗史》，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72年，第736—739頁。

③ Mark A. Whaley, "An Account of 13th Century Qubchir of the Mongol 'Great Court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4, No. 1 (2001), p. 52.

④ 汪海林、鍾昌文：《對疏附縣發現察合台汗國窖藏銀幣的研究》，《內蒙古金融研究錢幣增刊》（呼和浩特）2007年第1期，第16、23頁。

⑤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77頁。

⑥ 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 p. 162.

⑦ [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第75頁。

⑧ [元]孔齊：《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頁。

⑨ Nayef Abdullah al-Shamrookh, *The Commerce and Trade of the Rasulids in the Yemen, 630—858/1231—1454*, Kuwait: State of Kuwait, 1996, p. 304.

⑩ Philip Grierson, *Later Medieval Numismatics (11th-16th Centuries)*,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9, p. 49.

鑄造的阿斯皮爾（aspers）銀幣質劣，因而當局在其之後鑄造的銀幣上都做了特殊的標記以茲識別。^①受到東地中海貿易（Levant trade）影響，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出現白銀外流，而倫敦的銀幣鑄造量則大幅下降。^②在1360年後，歐亞大陸似乎共同經歷了白銀供應量的突然崩潰，而直到15世紀末前，白銀數量依舊短缺。

以上描述的歐亞大陸白銀充沛與短缺的現象是在各地幾乎同步發生的：13世紀末，在元朝廣泛發行紙幣後不久，倫敦鑄造的銀幣數量大幅增長；14世紀中期，孟加拉蘇丹國所發行的銀質盧比達到高峰，沒幾年倫敦鑄幣廠的發行量也達到高峰。^③

要證明當時歐亞大陸所流通的銀來自中國，一個可能的證據是，由於中國白銀可能含有較多的化學元素銻，這可以讓我們追蹤其所流通過的地方，不過這還有待科學的檢驗。^④蒙古政權所運行的相關機制，有助於促進白銀在歐亞大陸的廣泛使用。

四、制度偶然地創造了貨幣公度性

在蒙古征服撒馬爾罕（Samarkand）後不久所組織的稅制可看出他們建立了管理制度的原則。他們保持了既有的交易制度，即讓商人以黃金、一般百姓以銅錢交易，並讓商人以黃金、一般百姓以銅錢納稅。^⑤這一政策顯然是成吉思汗基於當地穆斯林的建議所制定的，因為這些穆斯林被認為是“熟識法規與慣例”的。^⑥不過，他們更考慮了蒙古人及其貿易路線的特徵，引入了白銀徵稅的制度。這樣一來，帝國間的通用貨幣單位便建立了起來，此制度在些許變動之下又靈活地保持了當地的現有制度，從而與通用體系相連結。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應用於整個蒙古帝國郵政運輸系統的統一度量衡體系。這一體系從朝鮮半島跨越東歐，支持了各地不同貨幣的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因為跨越了不同的行政管轄區域，故郵政運輸系統必須採用單一的計量單位，以避免各驛站的供應有太大的差異，例如，窩闊台可汗（Ögedei Khan）規定要為停靠於驛站的信使提供定量的糧食與酒。^⑦建立這包銀（qubchir）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支持整個蒙古帝國的郵政運輸系統。因此，即便各地市場使用不同的計量單位，整個蒙古帝國如其郵政運輸系統一般，也有其標準的計量體系。

① Nicola Di Cosmo, “Mongols and Merchants on the Black Sea Frontier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Convergences and Conflicts,” in Reuven Amitai, Michal Biran (ed.),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Leiden: Brill, 2005, p. 415.

② Jere L. Bacharach, “Monetary Movements in Medieval Egypt, 1171-1517,” in John F. Richards,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pp. 159–181. 艾倫（Allen）估計英國的白銀流通量於1351年為70到90萬之間，而至1422年便下降到15到20萬，可參閱Martin Allen, “The Volume of the English Currency, 1158-1470,”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4, No. 4 (2001), pp. 595–611.

③ Kuroda Akinobu, “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276-1359: 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 i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Issue. 2 (2009), pp. 253–54.

④ Robert P. Blake,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No. 3-4 (1937), p. 328.

⑤ Judith Kolbas, *The Mongols in Iran: Chingiz Khan to Uljaytu 1220-1309*,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68.

⑥ Thomas T.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of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

⑦ [日]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の度量衡：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文献からの再検討》（中譯約為《蒙古時代的度量衡：依據東突厥斯坦出土文献的再探討》），《東方學》（東京）2004年總第107期，第153–166頁。

元朝與西部汗國發展的不同之處在於：元朝稅收白銀化的同時還伴隨着實際紙鈔的支付，而西部汗國並未發行紙鈔，因而稅收是通過徵收實際白銀而進行的。伊兒汗國試圖在1294年引入紙鈔體系，但並無結果。^① 貨幣制度之間的差異對跨區域貿易產生的影響，正如佩戈洛蒂描述的那樣：通常，意大利商人將亞麻布帶到薩萊（Sarai）或烏簡崎（Urjench）用以交換白銀，尤其是欽察汗國的索莫（somo）；接着他們來到杭州，把白銀換成寶鈔，這樣他們便可以用寶鈔來購買絲綢和瓷器。^② 來自歐洲的訪客，包括馬可波羅（Marco Polo），一致地發現寶鈔在中國穩定流通。不過，我們必須要問，在薩萊和烏簡崎流通的白銀又是從哪裏來的？白銀向西流動的一個顯著證據，是被稱作“投下”的西部汗國封地的貢金。在佔領了中國北部即金國戰敗後，蒙古帝國將封地賜給諸子及各貴族，以供其飼養馬匹、安置勞力及收取糧食。在1257年的整個帝國的人口普查後，蒙哥可汗將土地分封給歐亞大陸的貴族。隨後，蒙古人便開始分享其領土。元在伊朗有其封地，就如西汗在中國有其封地一般。隨着旭烈兀可汗（Hulegu）向蒙哥可汗進貢，蒙古可汗封地之間的情況必然促進了白銀的遠距離流動。^③ 在蒙哥可汗掌權時期，這一制度雖未對其經濟帶來重大改變，但在1276年中國南部窯藏的大量銀錠被併入到投下制度之內後，卻燃起了白銀前所未有的發展。13世紀晚期至14世紀中期，駐紮在亞洲北部及中部的遊牧貴族一度能直接從中國南方富裕地區獲取收益。

中國南部的采邑高峰首始於1276年，這必然是南宋的領地被佔領之故。1276—1285年之間在江南一共建立了124萬戶采邑。根據每戶納貢5錢的中統鈔，每年整個貢納高達30萬兩，相當於12公噸的白銀。新封地的建立在1285—1298年間暫停，但隨着巴圖（Batu）對元的反抗結束，情況有所緩和。新舊投下封地的建立和貢品的轉移體系，可能促進了西歐亞大陸的第二次鑄銀高潮。1297—1298年，伊兒汗國合贊派遣使節攜禮出訪元朝，返程時帶回了旭烈兀可汗在中國佔領地所獲的絲質產品，^④ 而相關博物館的硬幣收藏表明在1300年左右，伊兒汗國的鑄幣突然達到高峰。^⑤

撇開這兩個新封地的建立高峰時期，就欽察汗國而言，其通過投下系統的進貢轉移於1339年開始第三個高峰期。可汗將中國的平陽、晉州及永州的領地進行分封。元史記載，自1339年起，每年有價值2,400錠的中統鈔流入欽察汗國，^⑥ 這一數額相當於2,300千克的白銀。2007年，在老奧爾海伊（Orheiul Vechi）——欽察汗國的一座堡壘小鎮裏挖掘出了一個裝有65條銀條的罐子。這一

① 同年，在元朝也禁止使用金屬貨幣。因強制要求使用被稱作鈔（Chao）的紙幣，終止了伊兒汗國的貿易。兩個月之後，伊兒汗國不得不廢除了這項政策。Rafiuiddin Makhdumi, “Mongol Monetary System,” in R. C. Sharma (ed.), *Perspective on Mongolia*, Delhi: Seema, 1988, p. 52—53. 這一年，白銀產量下降。A. P. Martinez, “Regional Mint Outputs and the Dynamics of Bullion Flows through the Il-Khanate,” i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8, 1984, p. 165.

② Robert S. Lopez,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58.

③ Arsenio P. Martinez, “The Il-Khanid Coinage: An Essay in Monetary and General History Based Largely on Comparative Numismatic Metrology,” 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17, 2011, p. 93.

④ Martin Allen, “The Volume of the English Currency, 1158—1470,”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4, No. 4 (2001), pp. 49—50.

⑤ A. P. Martinez, “The Wealth of Ormus and of Ind: The Levant Trade in Bullion, Intergovernmental Arbitrage,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s in the Il-Khanate,” 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9 (1995—1997), p. 153.

⑥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906頁。

罐子被認為是在1340—1360年間留下的。^①裏面的銀條具有兩個特徵，表明其與中國的聯繫。其一是它們的重量，它們很明顯是按照約200克的重量鑄造的，也就是相當於5兩，即銀元寶重量的十分之一，這些銀條必定是當人所稱的索莫（somo）。其二是其表面，這與後文中提到的中國銀錠表面相似。^②這一發現清楚地表明了來自中國的白銀貢品必然抵達了欽察汗國。

因此，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下，歐亞大陸有兩條白銀的流通道路：一條道路自東流向中國，白銀用以購買絲綢、陶瓷以及其他物品，它們一抵達目的地便被轉換成寶鈔。另一條則向西流動，部分白銀被用於購買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產品，比如馬和鈷，另一部分（主要的部分）用作那些歸西汗所有的中國投下的稅收匯款。

13世紀70年代末，紙鈔在中國普及，這使得西汗與元的貨幣制度產生了鮮明對比，^③而這兩種均以白銀計價的不同貨幣亦變得普遍起來：西汗使用像索莫（somo）這樣的銀幣，而元則採用中統鈔。只要以銀計價的紙幣能夠在蒙古所佔之地的東部替代白銀，那麼白銀便無可避免地會將通過匯款或投資等各種方式流入西部。重要的是，以投下為渠道的規模空前龐大的進貢，是通過面額很高的銀條運送來完成的。它們的功能與之前流通的銀幣如迪拉姆（dirham）和迪納里厄斯（denarius）銀幣極為不同。銀條在歐亞大陸之間的流動，使人類第一次擁有了跨越文明邊界的區域計價單位。

這裏需要記住的是，直到13世紀70年代，鍍銀銅幣一直在中亞佔據主要地位。察合台汗國也鑄造了鍍銀銅幣，但在馬蘇德貝格（Masud Beg）禁止發行鍍銀銅幣之後，成色高的銀幣發行量便在13世紀80年代開始上升。老奧爾海伊挖掘出土的便是成色高且表面佈滿了小孔洞的銀條，這有孔的表面證明了其白銀的純度，同時，這也是8—20世紀期間中國長期使用的鑄銀方式的表現。此外，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塊被認為來自14世紀諾夫哥羅德的銀條格里夫尼亞（grivna）與老奧爾海伊挖掘出土的銀條一樣，也具有泡泡似的表面。因此，我們可以假設突然充裕的白銀供應使通行銀鍍銅幣的中亞開始採用這種表面帶孔的銀條以證明其純度。俄國基輔（Kievan）早已有了被稱作格里夫尼亞的銀條。不過，直到諾夫哥羅德進貢給欽察汗國的貢品從毛皮轉為白銀之後，格里夫尼亞才普及起來。^④格里夫尼亞是盧布的最初形式，源自單詞rubit（直譯為“切”），指名為銀條。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兩條格里夫尼亞，重量差不多是索莫的一半，這可能並不是簡單的巧合。

根據充公記錄，直到14世紀晚期，銀條在布魯日（Bruges）一直是最普遍的流動資產，而當其在意大利商人間被黃金所取代時，索莫在歐亞大陸西部白銀化的進程中或許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要注意的是，德國漢薩同盟（Hanse trade）的行業壟斷將諾夫哥羅德的貿易與布魯日毛皮貿易連接了起來。^⑤

① Ana Boldureanu, “Some Remarks on the Metrology of the Golden Horde Silver Ingots in the Light of a Hoard Found at the Orheiul Vechi,” <http://www.arheomet.ro/ro/evenimente/simpozion2007/rezumate/boldureanu.html>.

② 感謝Ana Boldureanu博士，筆者在2016年9月21日有幸可以在摩爾多瓦國家歷史博物館中觀察並為這些銀條秤重。

③ 在土耳其斯坦，寶鈔在元1280—1287年的佔領期間開始流通；而在這一時期前後，其並未使用紙鈔。[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第77—78頁。

④ Janet Martin, “The Land of Darkness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Fur Trade under the Mongols XIII-XIVth Centuries,” 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 19, No. 4 (1978), p. 406.

⑤ Sheilagh Ogilvie, *Institutions and European Trade: Merchant Guilds, 10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7; 亦可參考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因此，14世紀上半葉自西向東橫跨的歐亞大陸，有一系列可公約的貨幣：西歐是金弗洛林（florin）或大塊銀羅（gross），西汗是索莫（somo），而中國則為元寶（以錠計數）。五弗洛林相當於一索莫，羅馬帝國滅亡之後，這一金幣首次出現於西歐。事實上，早在14世紀40年代這一貨幣便開始流通，當時也正是鑄銀的第三個高峰時期。^①使用黃金的地中海東部地區，其銀幣發行量不斷增加，為把黃金更好地銷售到西歐創造了條件。^②而十索莫相當於一塊銀錠（元寶）。因而，在西歐至朝鮮半島這貿易區間內，便有着一套可以方便兌換的貨幣制度（圖1）。

一條重200克的銀條與像迪拉姆（dirham）這樣重約3克的銀幣有着極為不同的功用，它對於長途貿易的商人以及大規模貴重物品的交易來說較為便利，但對於普通人的日常交易來說就不那麼切實可行了。在下一節中，我們會看到，在更低層級的市場交易中，流通着多種不同的當地貨幣。

我們已經知道，在歐亞大陸東部並不常使用真正的白銀。交易大多依賴寶鈔進行，尤其是在中國北方，常常以中統鈔來進行買賣。寶鈔被用於支付以白銀計價的稅款，以及兌換那些由西方商人帶到中國的銀條。當中國拒絕寶鈔時，讓銀條可以廣泛地沿着歐亞大陸貿易渠道流通的制度環境也崩塌了，這一過程發生在14世紀60年代。

倫敦皇家造幣廠每年都對所鑄銀幣有所記錄。鑄銀的高峰期發生在1278—1288、1300—1314以及1344—1355年，這段時期每年鑄造的銀幣量高於拿破崙戰爭之前的任何時期。^③歐洲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中期的這三個鑄銀高峰期，正好與投下匯款的高峰期重合。

五、分層市場及其使用的貨幣

如上一節所提，在橫跨大陸的高層貿易中，未經鑄造的白銀是主要的交易單位。中國與其周邊地區所使用的元寶銀錠、土耳其斯坦至東歐所延伸的區域所使用的索莫銀條，似乎均流通廣泛。不過，這些未經鑄造的金屬中的含銀量各不相同。

在摩爾多瓦老奧爾海伊的一個可追溯至1340—1360年的遺址中，發掘出土了65條銀條（圖1），其重量約在173—227克之間，^④平均而言，這些銀條的重量大約分佈在200克左右，不過偏差較大。同樣的，元寶銀錠的重量也有偏差，其重量平均約為50兩。^⑤10世紀爪哇島附近發生的伊坦（Intan）沉船中，發現了72塊銀錠，其重量也不等。這表明未經鑄造的白銀從未以同等重量的銀錠形式在中國流通。^⑥

① 僅在1340年之後，黃金才在中世紀歐洲的金融中心布魯日（Bruges）成為重要的貨幣。James M. Murray, *Bruges, Cradle of Capitalism, 1280-13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95—296.

② 西里西亞（Cilicia）的茹盆尼蒂鑄幣廠（Rupenid mint）以高於當地匯率的價格購買國外白銀以獲取更多的黃金。A. P. Martinez, “The Wealth of Ormus and of Ind: The Levant Trade in Bullion, Intergovernmental Arbitrage,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s in the Il-Xanate,” 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9 (1995-1997), pp. 226—227.

③ 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4—205.

④ 現存於摩爾多瓦國家歷史博物館，庫存清單號為24875(1-65)。

⑤ 在元統治期間鑄造的銀錠，帶有表示50兩的銘文，其重量差異極大。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 pp. 482—484. 這與在同一句容縣（現句容市）1277年同年澆鑄出的四塊銀錠極為不同，這四塊銀錠之間的重量差異僅在3克左右。

⑥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Oxford: Archaeopress, 2002, pp. 84—85.

圖1 摩爾多瓦老奧爾海伊遺址挖掘出土的65索莫



圖片來源：摩爾多瓦國家歷史博物館Ana Boldureanu博士提供。

在東方，白銀最初是絲綢的替代品。在交易時，很少人會擔心一匹絲綢在長度或重量上的差異。同樣地，無論是東方的元寶還是西方的索莫，在重量或長度上都沒有明確的標準，這與後來重商主義國家根據固定的度量衡進行交易有所不同。蒙古帝國政權下的經濟活動並不依賴白銀的物質內容，相反，白銀作為交易記賬單位，主要是一個概念性的角色，但它是整個大陸貨幣公度性的基礎。同時，那貨幣公度性隨着兩種貨幣之間的分工更為發達。一是用於區間貿易清算，二是用作當地交易。即便我們可以證實13世紀末某些城市如熱那亞（Genoa）和大不里士（Tabriz，位於現在的伊朗境內）可以使用匯票進行交易，^①但在跨越歐亞大陸的西部時，索莫也必然發揮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成為連接各地不同貨幣的橋樑。不過，這一聯繫並不意味着不同市場上價格通過以白銀計價的方式相互聯結。因為當地市場的聯繫其實相當鬆散，而在不同的地方，其大部分物品是自由定價的。

根據俄羅斯法律後期的一個版本，一位帶有一個女兒的女性工人的年薪為一格里夫尼亞，^②從“年薪”這個較大的計算單位看來，格里夫尼亞這一貨幣必然不適合用於一般市場交易。市集交易通常在週五進行，那時農民會將自己的貨品帶到市集出售。^③格里夫尼亞可被分割成更小的貨幣單位如諾格塔（nogata）和勒扎納（rezana），1格里夫尼亞相當於20諾格塔和50勒扎納，而其最小的單位是維克薩（veksha）（直譯為“松鼠”）。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1諾格塔等

① Sergii Moshenski, *History of Weksel: Bill of Exchange and Promissory Note*, USA: Xlibris, 2008, p. 197.

② 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26.

③ 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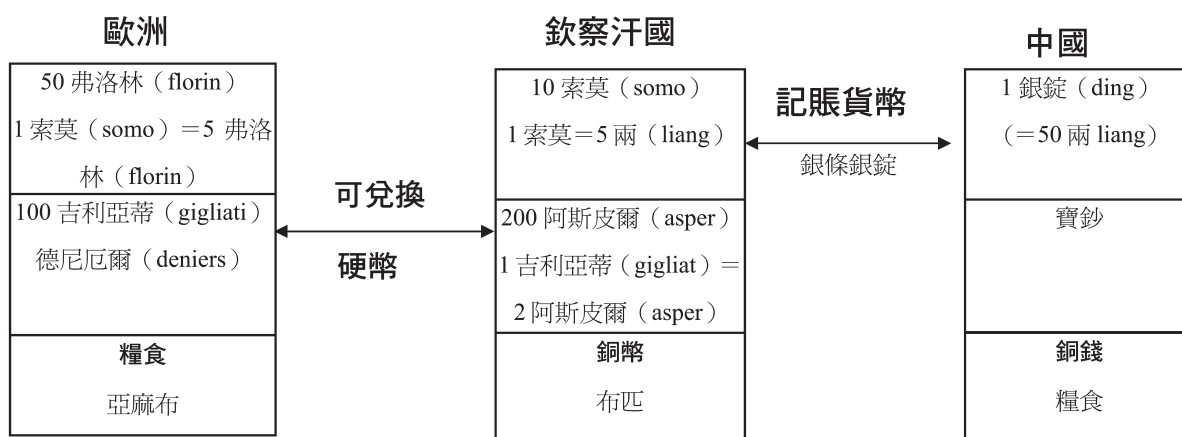
於24維克薩。^①為了促進農產品在市場上更好的交易，毛皮貨幣（或成色低的白銀作為毛皮的替代品）這類像維克薩一樣的小額貨幣是必不可少的。

在欽察汗國，廣泛流通着一種叫做塔木格（tamga）的銀幣。理論上來說，1索莫相當於120塔木格。如上所提，在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塔木格也代表着商業稅。在伊兒汗國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它還可用作表示關稅。這表明塔木格這一銀幣可能在西歐亞大陸廣泛流通使用。^②

諾夫哥羅德還有格里夫尼亞的次貨幣單位，即丹吉（den'gi）。1格里夫尼亞等於100丹吉。在察合台汗國發現的源自13世紀末刻有銘文的銀幣，重約1.8—2.0克，它們差不多是吉利亞蒂（gigliate）的一半重量，或一兩的12分之一，這些銀幣或許應該是與丹吉等值的，而不是塔木格。^③它們可能是在馬蘇德貝格（Masud Beg）將銀幣重量統一為2.1克的改革之後鑄造的。^④

在亞速海（Sea of Azov）上的塔納（Tana），索莫用於長途貿易，以購買物品，而鑄幣廠則用1索莫中的銀來鑄造200阿斯皮爾（aspers），以在當地交易中使用。熱那亞1304年的一法令將欽察汗國のアス皮爾視作等值於10熱那亞的德尼厄爾（Genoese deniers）。而拜占庭弗洛林相當於16分之一的阿斯皮爾，被用於日常生活中購買蔬菜和其他小商品（圖2）。^⑤

圖2 多層級貨幣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① 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22.
 ② M Fuad Köprülü (au.), Gary Leiser (trans. and ed.),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67.
 ③ 汪海林、鍾昌文：《對疏附縣發現察合台汗國窖藏銀幣的研究》，《內蒙古金融研究錢幣增刊》（呼和浩特）2007年第1期，第17—18頁。
 ④ E. A. Davidovich, A. H. Dani, “Coinage and the Monetary System,” in M. S. Asimov, C. E. Bosworth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4 (Part 1),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8, p. 406.
 ⑤ Robert S. Lopez,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56;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3,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p. 159.

塔納（Tana）的例子表明，商業交易往往有三個層級，而每個層級又都有自己獨特的貨幣。像索莫這樣銀條會在高層級的區間貿易中使用；當地鑄幣廠會發行銀幣以供當地納稅或其他使用，例如阿斯皮爾便是由熔化了的銀所製成；與此同時，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更小額的銀幣也因價值過高而不適用，因此，在大多數的小額交易中，往往使用各式各樣由其他金屬製成的貨幣，如銅弗洛林。這三種貨幣協同合作，分別用作不同層級的商業交易。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為補充的。

在蒙古帝國時期，歐亞大陸出現了各個層級的商業活動，流通着多種貨幣。在元朝，因法規要求，紙鈔使用廣泛。不過，市場上依舊存在更低層級的交易，需要使用幾種當地貨幣。如上文所述，在前南宋地區，銅幣依舊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在雲南，貝幣（cowries，即馬爾代夫的貝殼貨幣）在當地交易中則更為普遍。同時，像在中國北部，因沒有足夠小面值的貨幣可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商人提供了各種物品以補正式發行的紙幣之缺，其中包括木牘等。除此之外，在農村地區，糧食也還繼續充當着貨幣的角色。

結語

前工業時代的貨幣制度結合了低層級（或當地）及高層級（或區間）市場的交換方式。由於鄰近與長途交易在規模、頻率及季節性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兩種市場的貨幣各自獨立運作。^①蒙古帝國政體雖未嚴重影響低層級市場的交易，但因其在整個帝國內的貢品轉移上需要採用統一的計量體系，恰巧為長途貿易建立了公度性，隨後其還觸發了整個交易體系在全球範圍的轉型。在老奧爾海伊發現的65條銀條更證實了以下結論：即通過投下的進貢轉移體系，高面值的白銀在14世紀橫跨了歐亞大陸，且使得東自朝鮮半島西至倫敦的相關經濟活動同步進行。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擁有貨幣流通的城市與自給自足的農村的橫向對立，使我們忽視了貨幣之間垂直分佈的多樣交換性與互補性。Kuroda Akinobu, “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in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pp. 7–15.